

# 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北方文化因素

滕铭予 王春斌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本文中的三晋地区,是指从黄河沿岸到黄土高原东南缘的区域,包括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山西、陕西东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东周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是被称为周文化在东周时期直接继承者的晋文化及三家分晋后的三晋文化,也包括了东周时期的周王室及后分封的东周与西周两个小诸侯国的文化,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三晋两周地区,或统称这一地区为中原地区<sup>[1]</sup>。北方文化是指分布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内外地区的古代文化,这一地区西起祁连山东麓,经鄂尔多斯高原和桑干河流域,东到燕山山地,最北可到燕山北麓,其南可到黄土高原南缘<sup>[2]</sup>,包括今天的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等。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原地区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列国争雄之后,最终从封国走向了秦帝国的统一<sup>[3]</sup>;中国的北方地区则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面貌相对一致的游牧文化带<sup>[4]</sup>,同时两个地区的古代文化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产生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上的互动。本文拟从分析东周时期三晋地区所见到的北方文化因素入手,尝试讨论在东周时期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以及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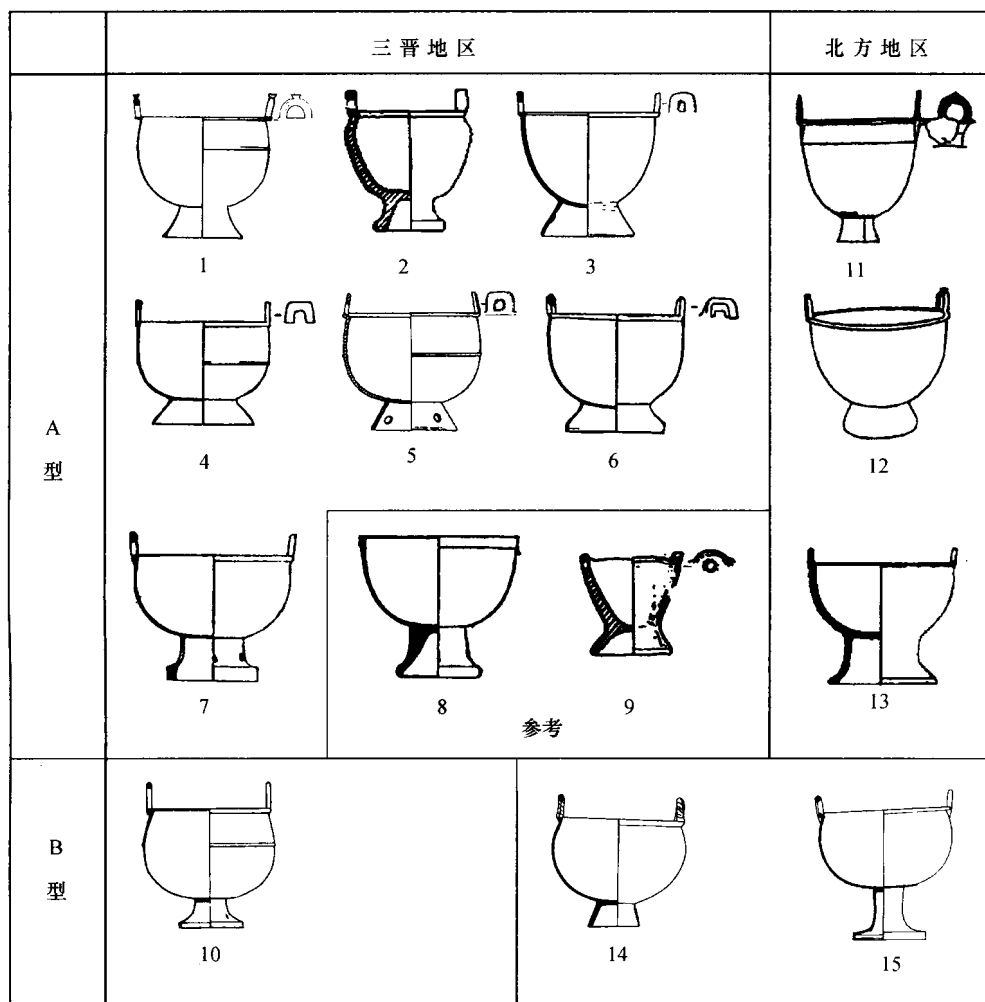
—

目前在东周时期三晋地区所见北方文化因素多为出于墓葬的随葬器物,按其种类分别介绍如下。

## 1. 铜(陶)鍪

铜鍪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使用的代表性器物<sup>[5]</sup>,在中国西起陇山,东至燕山的广大北方地区,也都有这一时期的铜鍪出土。笔者曾于2002年作《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下文简称《探讨》),对在包括了本文所论北方地区以及秦地和三晋地区出土的铜鍪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对其年代、源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sup>[6]</sup>,本文将延续《探讨》中对铜鍪的类型划分。三晋地区已发现的铜鍪主要见于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大多为《探讨》中所划分的A型鍪,少数为B型鍪。

A 型鍳，直口，口沿下腹部斜直，于腹中部以下内收呈弧形。闻喜上郭村 76M1:3，沿上双耳，耳断面为八棱形，上端有倒三角形小凸起，口沿下直腹，腹上部有一周凸弦纹，腹下部内收圆缓，矮圈足呈喇叭状，通高 29.2 厘米<sup>[7]</sup>（图一，1）。侯马上马 M13:59，口微敛，沿上双耳，下腹斜收，矮圈足呈喇叭状，通高 7.5 厘米<sup>[8]</sup>（图一，2）。侯马上马 M2008:45，口微敞，沿上双耳，腹斜收，矮圈足呈喇叭状，上有一穿，通高 6 厘米<sup>[9]</sup>（图一，3）。临猗程村 M0002 出土了两件鍳，二者均为直口，沿上双耳，口沿下直腹，M0002:115 在腹中部有一周凸弦纹，圈足粗矮，呈喇叭状，通高 5.4 厘米（图一，4）；M0002:120，其本同于前者，素面，圈足在近地处有一周凸棱，通高 6.8 厘米<sup>[10]</sup>（图一，6）。临猗程村 M1072:69，形制基本同于 M0002:115，只是圈足上有四



图一 铜（陶）鍳

1. 闻喜上郭村 76M1:3 2. 侯马上马 M13:59 3. 侯马上马 M2008:45 4. 临猗程村 M0002:115 5. 临猗程村 M1072:69 6. 临猗程村 M0002:120 7. 太原金胜村 M251:46 8. 太原金胜村 M251:260 9. 侯马上马 M1010:15 10. 沁水桃花沟 M:01 11. 传出于内蒙古中部 12. 宝鸡甘峪 13. 新乐中同村 M2:6 14. 延庆玉皇庙 M18:1 15. 延庆玉皇庙 M250:1

穿,制造粗糙,通高 6 厘米(图一,5)<sup>[11]</sup>。太原金胜村 M251:46,沿上双耳,腹较浅,圈足较高,在近地处有一周凸棱,通高 7.3 厘米(图一,7)。另太原金胜村 M251 还随葬有一件无耳的高圈足器(M251:260),从其整体态看与同墓所出铜甗相近,很可能是铜甗的简略形式(图一,8)<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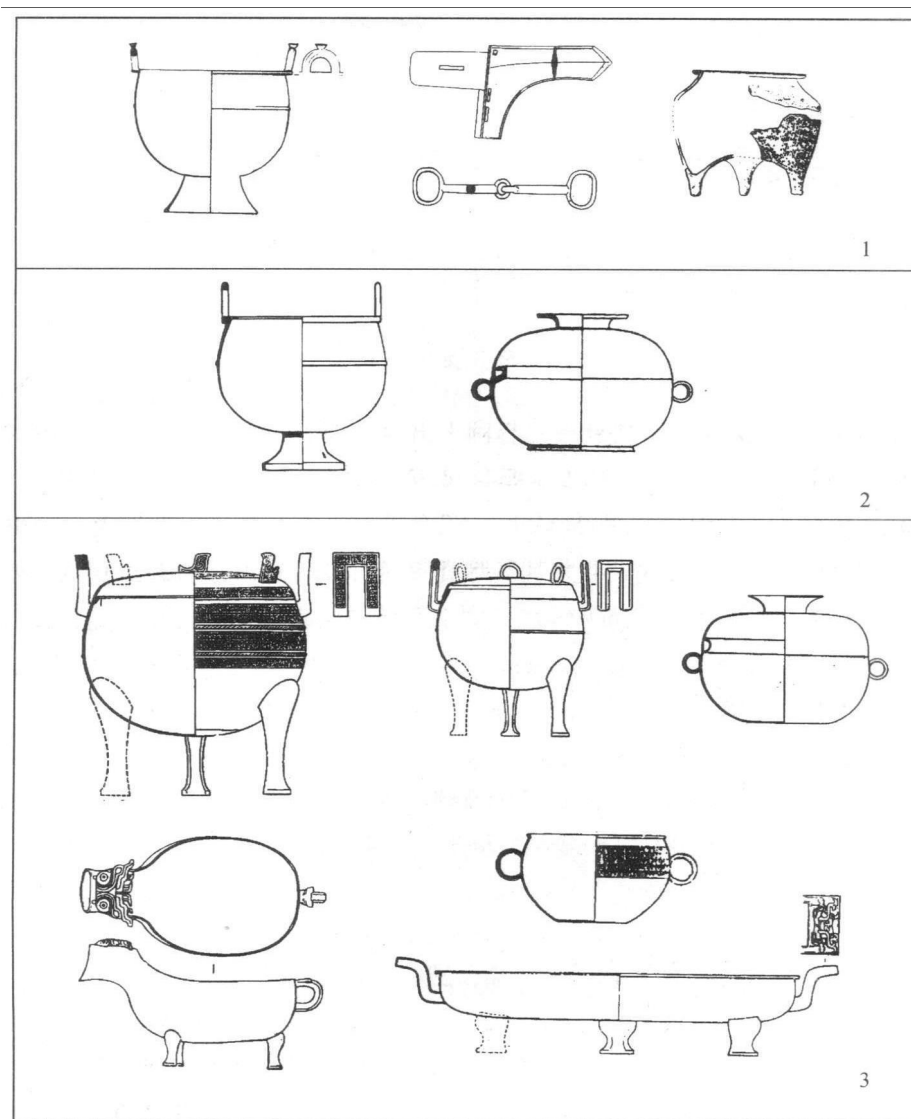
B 型甗,敛口,腹较 A 型为浅。沁水桃花沟 M:01,敛口,沿上双耳,腹中部靠上有一周凸弦纹,腹下部圆鼓,圈足较高,上部较细,近地处有一周凸棱,器表见烟炱,通高 24.8 厘米<sup>[13]</sup>(图一,10)。

《探讨》一文已对三晋地区东周时期出土的铜甗在进行型式划分的基础上对各型式的年代进行了讨论,只是当时对年代的判断较为宽泛,现对所涉墓葬的年代作进一步的论述。

随葬有 A 型甗的闻喜上郭村 76M1 由于共出有圭首戈以及晋南地区春秋早期晚段常见的陶鬲,其年代大体在春秋早期晚段,最晚可到春秋早中期之际<sup>[14]</sup>(图二,1)。侯马上马 M13 因共出有徐国的“庚儿鼎”,据研究此鼎作器者“庚儿”即徐王庚,器乃其为世子时作,制成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 550 年左右,因此上马 M13 的年代上限不过此年,其年代大体在春秋中期晚段,其下限可到春秋中晚期之际<sup>[15]</sup>。侯马上马 M2008 原报告将其划为该墓地的四期 7 段,年代为春秋晚期早段,《中国青铜器综论》亦持同样看法<sup>[16]</sup>。临猗程村 M0002 出有两件铜甗,形制稍有区别,因其均从村民手中征集,原报告称很可能有相互混淆或佚失者<sup>[17]</sup>,这给其年代的判断带来了一定困扰,不过可以根据其所出铜甗的形制推测其年代。临猗程村 M0002:115 与临猗程村 M1072:69 在形制上非常相近,只是后者口微敛,圈足有穿;临猗程村 M0002:120 器身形制与上述两器相近,只是圈足近底处稍向外凸,年代可能稍晚。临猗程村 M1072 原报告认为其为该墓地的第二期,年代在春秋晚期,《中国青铜器综论》则进一步判断其年代在春秋晚期晚段,因此临猗程村 M0002 所出铜甗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晚段,或可到春秋战国之际。太原金胜村 M251 为晋国重卿之墓,报告作者提出其年代在公元前 470~前 450 年,由于对战国起始年代的不同看法,报告认为应属于春秋晚期<sup>[18]</sup>,而《中国青铜器综论》则采用学界对战国起始年代的主流意见,明确提出该墓为战国早期墓葬<sup>[19]</sup>。

出土有 B 型甗的沁水桃花沟 M:01,据原简报称共出的还有一件带盖平底敦,其盖扣合在敦身之外(图二,2),与三晋地区春秋时期常见的敦盖扣合于器身口沿之上不同,与之相近者有侯马上马 M1006:7,上马 M1006 共出有带盖鼎,双耳外撇的盘,以及平底舟等(图二,3),上马墓地报告作者认为 M1006 为该墓地的四期 7 段,大体相当于春秋晚早段<sup>[20]</sup>,《中国青铜器综论》亦持同样观点,由此沁水桃花沟 M:01 的大体也应在春秋晚期早段。

陶甗仅见于侯马上马墓地,上马 M1010:15,手制,敞口,斜直腹,沿上两耳各一穿,小圈足,通高 6 厘米<sup>[21]</sup>(图一,9)。上马 M1010 共出一套青铜礼器,有鼎、簋、盘、匜、甗各 1 件,原报告将其划归该墓地第三期 5 段,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段,不



图二 铜鍱年代比较

1. 闻喜上郭村 76M1 2. 沁水桃花沟 3. 侯马上马 M1006

过其中所出盘双耳上沿外撇，是中原地区春秋中期晚段以后铜盘的特点，《中国青铜器综论》认为其年代在春秋中期晚段，可从。

## 2. 带钩

带钩作为系带之服饰用品，在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流行，虽然其出现的年代可早到春秋晚期，但数量很少，在三晋地区发现的战国早期的人俑上，其系带方式仍只见腰带而不见带钩，说明在战国早期三晋地区使用带钩系带并不普遍<sup>[22]</sup>。不过在

同时期的北方地区却发现大量的带钩,如在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遗存中出现了各种形制的带钩,有双纽兽形带钩、钩体呈飞禽形的小带钩、钩尾为长方形并饰圆点纹、或钩尾为圆形并饰多重圆点纹的带钩等,在形制和纹饰上都与此后在中原地区流行的带钩具有明显的区别,应为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特有的器物。目前在三晋地区发现的具有北方文化特点的带钩主要见于晋南运城盆地和洛阳地区,有以下几种形制。

A 型,钩首素面或有两眼似禽首,钩身向双侧展开类双翼,整体较小而纽较大。山西临猗程村 M0009:3,长 3.1 厘米<sup>[23]</sup>(图三,1);侯马上马 M2052:1,长 3 厘米<sup>[24]</sup>(图三,2)。

临猗程村 M0009 共出一件素面小陶鬲和石圭,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在春秋中期晚段,上马墓地 M2052 因仅出一件带钩,所以其年代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不过根据临猗程村 M0009 的年代看,大体也不早于春秋中期晚段。

B 型,钩首有双眼似禽首,钩身为长方形,上有六个圆圈形凸起,大纽。侯马上马 M4039:1,长 2.9 厘米<sup>[25]</sup>(图三,3)。

由于上马 M4039 仅随葬一件带钩,无法判断其年代。不过参考在玉皇庙文化遗存中出现此类带钩的墓葬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详见下文),上马 M4039 的年代上限亦不会超过春秋晚期。

C 型,钩首素面,钩体细长,近尾端为圆形,纽径几与尾端之圆相当,或素面,或有雷纹。临猗程村 M1084:2,钩体饰有小斜纹,钩尾之圆和纽面均饰向心的小圆圈纹,长 4.35 厘米,钩体最宽处 1.9 厘米<sup>[26]</sup>,其长宽比为 2.3(图三,4)。洛阳王城广场 LM8:7,整体素面,长 4.3 厘米,原报告未发表宽度数据,根据发表线图比例换算,宽度约在 1.67 厘米<sup>[27]</sup>,其长宽比为 2.6(图三,5)。侯马上马 M2216:2,钩体素面,纽面饰雷纹,长 4.9 厘米,钩体最宽处 1.7 厘米<sup>[28]</sup>,长宽比为 2.9(图三,6)。侯马上马 M1223:1,整体为素面,长 6.4 厘米,钩体最宽处 1.7 厘米,长宽比为 3.77(图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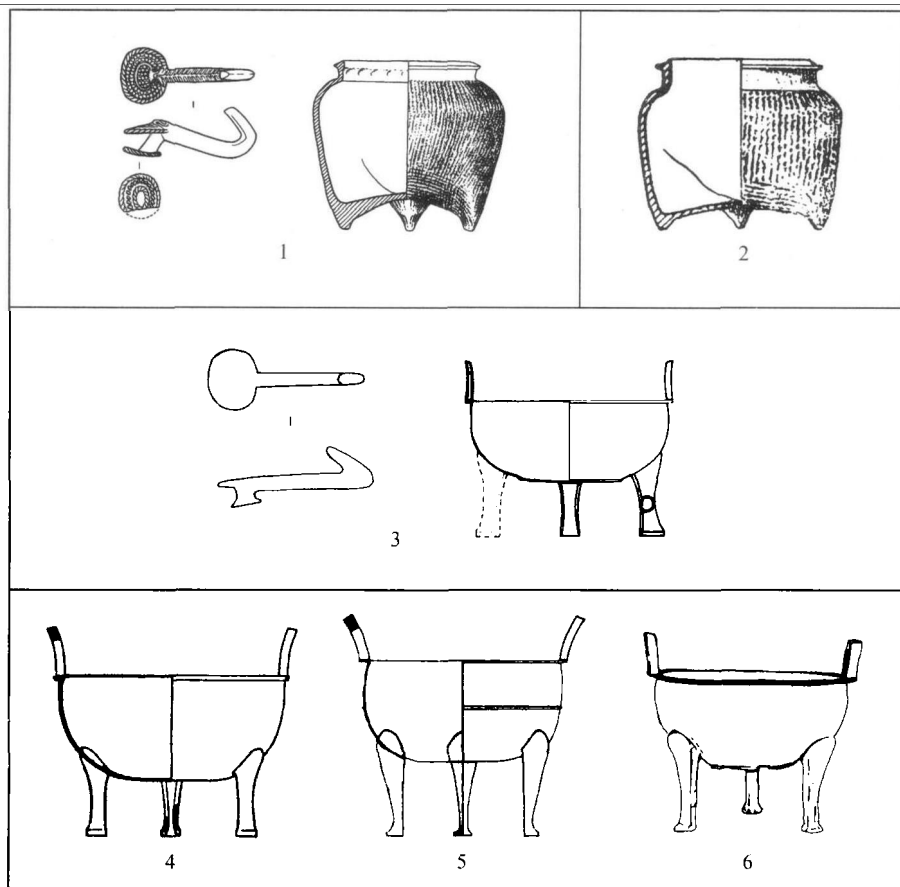
临猗程村 M1084 与带钩共出的有一件陶鬲和 4 件石圭。原报告将其划分该墓地的第一期,年代大体在春秋中期。观察其共出陶鬲尖唇,宽沿外折使口沿剖面呈三角形,小直领,有明显突起的圆肩,低裆,小锥状足跟(图四,1),与上马墓地 M4006 所出陶鬲(M4006:13)相同(图四,2)。上马 M4006 共出有鼎、盖豆、盘、匜、舟等一套青铜礼器,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在春秋晚期晚段<sup>[29]</sup>,朱凤瀚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亦将此墓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晚段。据此,临猗程村 M1084 的年代亦应在春秋晚期晚段。上马 M2216 和 M1223 两墓,除带钩外,都未出时代指征明显的器物,上马 M2216:2 纽面纹饰为雷纹, M1223:1 为素面,二者长宽比均大于临猗程村 M1084 所出,根据玉皇庙墓地同形制带钩在长宽比上表现出的相对年代关系,即长宽比越大者年代越晚(详见下文),上马 M2216 和 M1223 两墓应该已进入战国时期。洛阳王城广场 LM8 被盗扰,劫余的器物有无盖鼎、盘、匜、舟各 1 件,另还有器盖、车軎、骨贝以及海螺等。原报告

	三晋地区	北方地区
A 型	<p>1 2</p>	<p>8</p>
B 型	<p>3</p>	<p>9</p>
C 型	<p>4 5 6 7</p>	<p>10 11 12</p>

图三 带钩

1. 临猗程村 M0009:3 2. 侯马上马 M2052:1 3. 侯马上马 M4039:1 4. 临猗程村 M1084:2 5. 洛阳王城广场 LM8:7 6. 侯马上马 M2216:2 7. 侯马上马 M1223:1 8. 延庆龙庆峡 M36:6 9. 延庆葫芦沟 M6:4 10. 延庆玉皇庙 M250:13 11. 延庆玉皇庙 M173:1 12. 平山访驾村 M8102:9

认为该墓所出无盖鼎与洛阳中州路 M1 出土的无盖鼎形制相同, 其年代在春秋中期<sup>[30]</sup>。不过若对两者进行细致的比较, 就会发现洛阳中州路 M1:6 在腹部有一周凸弦纹, 两立耳亦较为粗壮, 而洛阳王城广场 LM8:3 为素面、立耳纤细, 直口、下腹稍弧、平底(图四, 3), 与之同样特点的鼎在长治分水岭 M269 (图四, 4) 和 M270 (图四, 5)、洛阳西工区 LBM4 (图四, 6) 均有发现, 《中国青铜器综论》中认为后三座墓的年代均在春秋晚期早段, 因此洛阳王城广场 LM8 的年代大体也应进入了春秋晚期。



图四 带钩年代比较

1. 临猗程村 M1084 2. 侯马上马 M4006:13 3. 洛阳王城广场 LBM8 4. 长治分水岭 M270:5  
5. 长治分水岭 M269:1 6. 洛阳 LBM4:14

### 3. 带扣

带扣同带钩一样也是系带之服饰用器, 不过其形制和系结方式都与带钩不同。带扣在内蒙古长城地带西起固原、东到岱海地区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中都有较多的发现, 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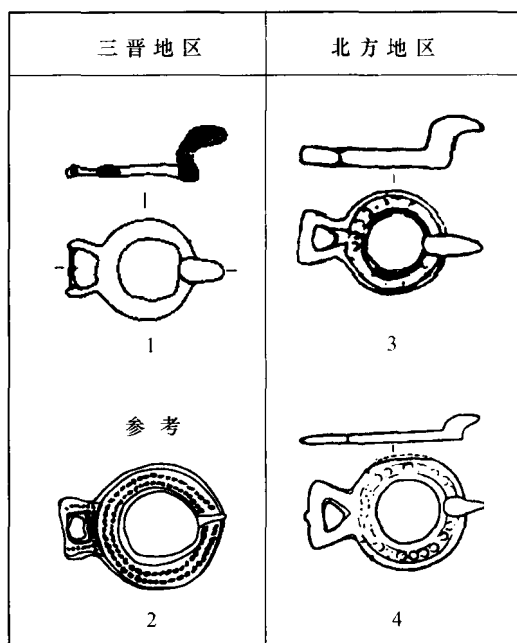
目前在三晋地区仅在陕西米脂张坪墓地 M2 发现有带扣。米脂张坪 M2: 14, 环状, 侧视似卧鸟, 尾端为梯形环, 头端向外突出成扣舌<sup>[32]</sup> (图五, 1)。

原简报指出张坪墓地属周文化系统, 其年代在两周之际, 亦有学者认为张坪墓地属于晋文化系统<sup>[33]</sup>,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当时陕北既非秦地, 亦非晋地, 张坪墓地属于既有周文化色彩, 又有地方特色的遗存<sup>[34]</sup>。从张坪墓地所出鬲、盆、豆、罐的组合与形制 (图六, 1), 均可在三晋地区春秋时期墓葬中找到相类者, 如侯马上马 M5291 随葬的陶器以鬲、盆、豆为主, 其鬲与盆的形制与米脂张坪 M2 所出非常接近 (图六, 2), 侯马上马 M2213 以鬲、盖豆、罐为主, 其鬲与罐的形制亦与张坪 M2 所出接近 (图六, 3), 由此米脂张坪 M2 还是表现出很强的晋文化特点, 张坪墓地的文化属性亦应以晋文化为主体。笔者曾根据侯马上马墓地分期与年代的研究结果, 将张坪墓地 M2 所出陶鬲与上马墓地陶鬲进行比较后, 提出张坪 M2 的年代相当于上马墓地第三期第 5 段, 即春秋中期早段<sup>[35]</sup>。另外张坪 M2 出土的折沿、斜唇、长颈、折肩, 肩以下饰绳纹和弦纹的陶罐, 还可与山西闻喜邱家庄 M13 所出的陶罐进行比较, 二者形制极为相似, 只是后者颈更长, 折肩位置更靠上, 表现出更晚的特征 (图六, 4)。闻喜邱家庄 M13 共出铜盖鼎和盖豆各 2 件, 盘、匜、舟各 1 件, 原报告作者认为其年代可到战国时期<sup>[36]</sup>, 不过其盖豆豆把细高, 豆盘无耳, 表现出较早的特点, 其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应该更为合理。考虑到张坪 M2 出土的陶罐较闻喜邱家庄所出要早, 因此将其年代定在春秋中期早段应该也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另外在山西怀仁杨谷庄墓地也出土了一件带扣 (图五, 2), 不过由于材料发表的局限性, 不能确知带扣出于哪座墓葬, 也不清楚出土带扣的墓葬与其他墓葬的关系<sup>[37]</sup>, 只能说明在东周时期这一地区确有使用带扣的人群存在。

#### 4. 有銎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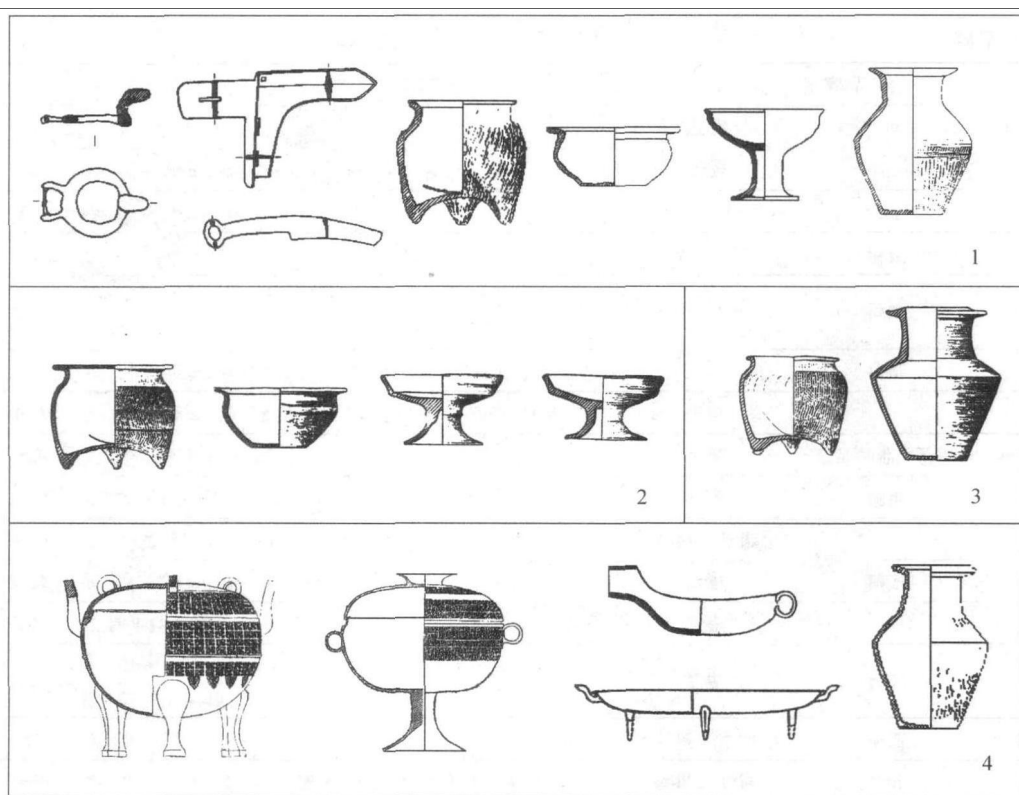
有銎兵器尤其是銎斧作为商周时期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兵器之一<sup>[38]</sup>, 在中国境内的北方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sup>[39]</sup>, 其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兵器的装柄方式也对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sup>[40]</sup>。到了东周时期, 在中国北方



图五 带扣

1. 米脂张坪 M2: 14 2. 怀仁杨谷庄 3. 准格西麻青  
4. 崞县窑子 M5: 6





图六 带扣年代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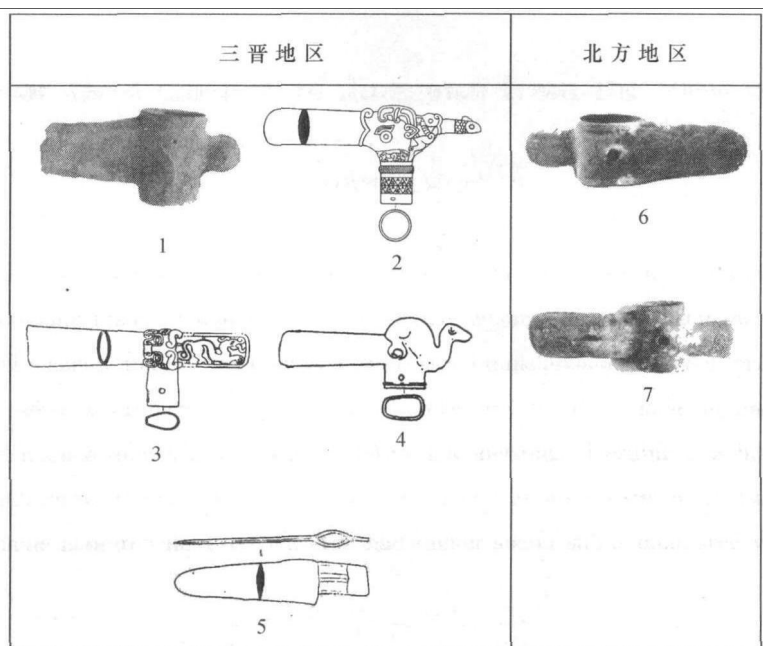
1. 米脂张坪 M2 2. 侯马上马 M5291 3. 侯马上马 M2213 4. 闻喜郭家庄 M13

地区的内蒙古岱海地区，有釜兵器以鹤嘴镐为主，而其西部的宁夏仍有釜斧出现。三晋地区出现的有釜兵器其数量不是很多，主要见于河南安阳地区和晋西南地区，以釜斧为主，有个别釜内式戈。

釜斧。汲县山彪镇 M1:110，圆釜，釜上有穿，刃呈头窄尾宽的梯形，尾部为圆锥形<sup>[41]</sup>（图七，1）。长治分水岭 M269:95，圆釜，釜有对穿，援平直，刃较圆钝，内两侧有两兽面纹，两兽面中夹一龟纹，龟口衔鱼，釜下端饰三角纹，上饰两兽<sup>[42]</sup>（图七，2）。侯马上马 M2008:20-2，椭釜，梯形刃，截面呈椭圆形，中空，尾部为长方形。釜上端饰兽面纹，尾端饰卧兽纹<sup>[43]</sup>（图七，3）。运城南相 M1:12，椭釜，釜内尚存朽木，梯形刃，釜上端饰卧兽，兽头向后<sup>[44]</sup>（图七，4）。

釜内式戈。太原金胜村 M251:704-4，长三角形援，无胡，椭圆釜，短内<sup>[45]</sup>（图七，5）。

山彪镇 M1 和太原金胜村 M251 为战国早期墓葬基本已为学界共识<sup>[46]</sup>，而侯马上马 M2008 与运城南相 M1 均共出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上马 M2008 原报告判断其年代为春秋晚期早段，《中国青铜器综论》亦持同样意见。运城南相 M1 共出的青铜礼器中鼎、甗、



图七 有纹兵器

1. 山彪镇 M1:110 2. 长治分水岭 M269:95 3. 侯马上马 M2008:20-2 4. 运城南相 M1:2  
5. 太原金胜村 M251:740-4 6. 中宁倪村 M2:1 7. 中宁倪村 M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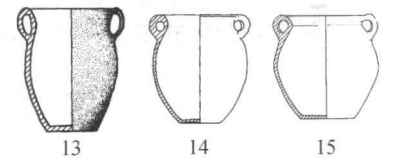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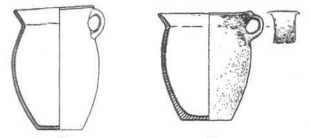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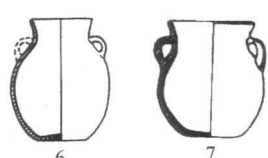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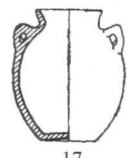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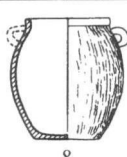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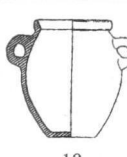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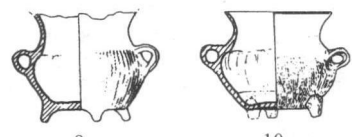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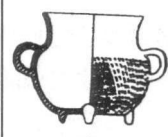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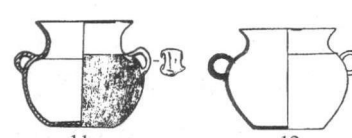

三足敦、盘、匜、舟等形制都与上马 M2008 所出同类器物相近，因此其年代应与上马 M2008 相当，亦为春秋晚期早段。长治分水岭 M269 原报告认为其属于春秋中期，而《中国青铜器综论》认为其属于春秋晚期早段墓葬，观察其所出铜鼎、铜敦，与侯马上马 M2008 所出几近相同，其年代当为《中国青铜器综论》所论之春秋晚期早段。

### 5. 带耳陶（铜）罐

带耳陶器东周时期多见于中国北方地区，有双耳罐、单耳罐、双耳鬲、双耳釜等，西到陇东的甘谷毛家坪，东到冀北山地都有发现，依地区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制特点。目前在三晋地区发现的带耳罐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在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太原盆地以及南流黄河两岸都有发现，依其腹部深浅可分为两类。

A 型 深腹。依耳的位置和唇部形态不同可以分为三种。

Aa 型 耳上端与口沿相接，有双耳和单耳两种。除侯马上马 M2028:4（双耳）为夹砂红褐陶<sup>[47]</sup>（图八，2）、清涧李家崖峰 M2:3（双耳）为泥质灰陶外<sup>[48]</sup>（图八，3），临猗程村 M0007:1<sup>[49]</sup>（双耳，图八，1）、侯马上马 M6364:3<sup>[50]</sup>（单耳，图八，5）、临猗程村 M1062:28<sup>[51]</sup>（单耳，图八，4）均为夹砂褐陶；双耳或单耳位于颈部，耳上端连于口沿，侈口，束颈，长弧腹较深，小平底，素面。

		三晋地区	北方地区
A	Aa	 1                      2                      3	 13                      14                      15
		 4                      5	 16
	Ab	 6                      7	 17
	Ac	 8	 18
B	Ba	 9                      10	 19
	Bb	 11                      12	 20

图八 带耳罐

1. 临猗程村 M0007:1 2. 侯马上马 M2028:4 3. 清涧李家崖峰 M2:3 4. 临猗程村 M1062:28 5. 侯马上马 M6364:3 6. 临县三交 M10:5 7. 清涧李家崖峰 M1:15 8. 柳林杨家坪 M1:2 9. 侯马下平望 92M3:5 10. 侯马古城南 57H4M2:8 11. 侯马古城南 63H4M8:8 12. 太原金胜村 M251:557 13. 甘谷毛家坪 T1③:2 14. 忻州窑子 M21:1 15. 忻州窑子 M11:2 16. 崞县窑子 M8:1 17. 崞县窑子 M7:3 18. 敖汉水泉 M50:2 19. 灵寿城岗北村 M8011:24 20. 平鲁井坪 M303:1

临猗程村 M0007 与双耳陶罐共出的有 1 件簋, 以及石圭、羊骨和幼猪骨等 (图九, 1), 原报告将其划归为该墓地第一期, 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不过报告作者也指出其所出簋似无豆把的盖豆, 观察其形态、纹饰确与同墓地 M1069 所出盖豆 (M1069: 2) 相似, 均子母口, 腹下部缓收, 盖的捉手上饰一圈锯齿形暗纹, 口沿下饰网状暗纹 (图九, 2)。M1069 原报告将其划为该墓地的第二期, 大体在春秋晚期早段, 而临猗程村 M0007 的年代也应与之相近, 可定在春秋晚期早段或春秋中、晚期之际。临猗程村 M1062 与单耳罐共出有鼎、盖豆、舟等铜礼器, 以及陶鬲、带钩、车害、戈等, 原报告作者根据青铜礼器的形制比较, 将其划归为该墓地的第二期, 大体相当于春秋晚期。侯马上马 M2028 与双耳罐共出的有被原报告认定为 II 式的铜带钩, 但没有发表相关图像, 根据原报告对带钩的式别划分, II 式带钩即包括了上文所述带钩中的 A、B 两型, 若据上文对这两种带钩在三晋地区出现的时间推测, 上马 M2028 的年代亦有可能进入春秋晚期。上马墓地 M6364 与单耳罐共出的只有石圭、琯以及被原报告认定的 III 式带钩, 亦未发表相关图像, 根据原报告对带钩的式别划分, III 式带钩为上文所述带钩中的 C 型, 若据上文对出土有这种带钩的墓葬年代判断, 该墓的年代大体也应进入春秋晚期。清涧李家崖峰 M2 共出有盖豆、敞口长颈壶 (图九, 3), 原报告认为此墓属于该墓地的第六段, 年代在战国晚期, 为秦治上郡时期的墓葬, 但其文化面貌基本以三晋文化为主。考虑到三晋地区在战国晚期时墓葬中多陶盒而基本不见盖豆, 因此该墓年代很可能早到战国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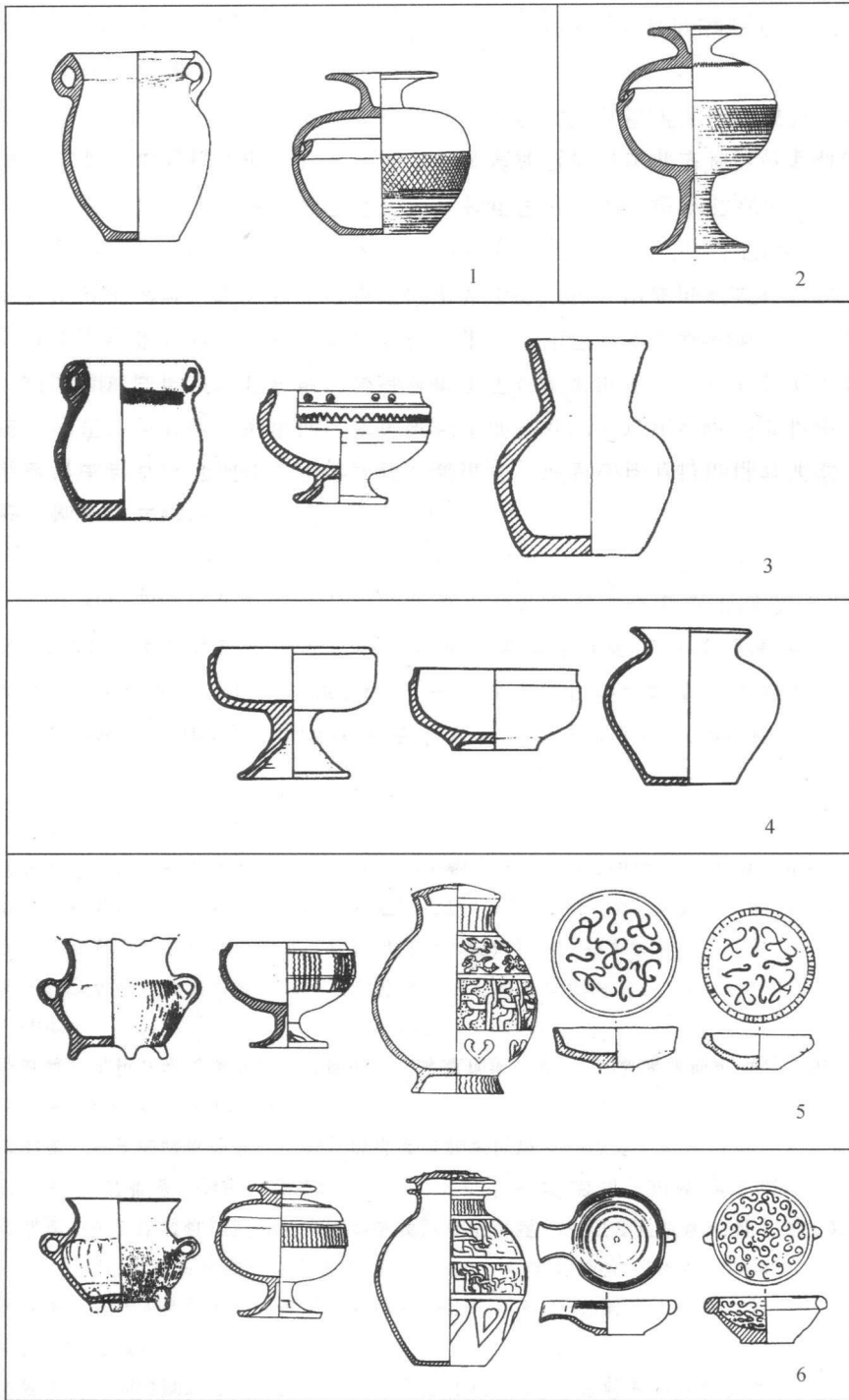
Ab 型 双耳位于肩部。侈口, 深腹, 平底, 素面。临县三交 M10: 5, 束颈, 圆弧腹较深<sup>[52]</sup> (图八, 6)。陕西清涧李家崖峰 M1: 15, 有颈, 圆鼓腹, 小平底<sup>[53]</sup> (图八, 7)。

临县三交墓地的发掘者根据部分墓葬中出有鼎、豆、壶、盘、匜、舟等成组的仿铜陶礼器而认为该墓地的年代应在战国早、中期, 而临县三交 M10 除了双耳罐以外共出有 2 件单耳杯 (图一〇, 1、2), 1 件已失盖的盖豆, 1 件钵和 1 件罐 (图九, 4), 并未共出有鼎、壶、盘、匜、舟等, 不过其共出的钵直口, 有小圈足, 三晋地区战国时期的钵多为平底, 很少见小圈足, 同时考虑到盖豆豆把较矮, 因此临县三交 M10 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可能更为合理。清涧李家崖峰 M1 原报告将其划归该墓地第 5 段, 年代大体在战国中期, 属魏治上郡之地时期的墓葬。

Ac 型 叠唇双耳罐。仅在柳林杨家坪 M1 有发现, 与上述两种双耳罐不同的是, 柳林杨家坪 M1: 2 为小直口, 圆唇, 深腹中鼓, 肩部饰两耳, 平底, 夹砂灰陶, 通体饰绳纹<sup>[54]</sup> (图八, 8)。

柳林杨家坪 M1 共出有铜鼎 1、铜盖豆 2, 陶鼎 1、陶豆 2 和陶壶 2, 原报告认为此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 可从。

B 型 浅腹, 依是否有三足分为二亚型。



图九 带耳罐年代比较

1. 临猗程村 M0007 2. 临猗程村 M1069:2 3. 清涧李家崖峰 M2 4. 临县三交 M10  
5. 侯马下平望 92M3 6. 侯马古城南 57H4M2

Ba 型 三柱状足。侯马下平望 92M3:5, 夹砂黑陶, 侈口, 颈微束, 腹较浅, 平底下有三足, 颈以下饰绳纹, 底部有烟炱<sup>[55]</sup> (图八, 9)。与下平望 M3:5 相同者还有侯马牛村古城南 57H4M2:8<sup>[56]</sup> (图八, 10)。

侯马下平望 92M3 与侯马牛村古城南 57H4M2 均共出有鼎、盖豆, 下平望 92M3 还共出有壶、舟、残豆盘和空首布 (图九, 5), 牛村古城南 57H4M2 共出有罐、匜和舟 (图九, 6), 两墓所出盖豆豆把较矮, 均于口沿下饰红色竖向波纹, 侯马下平望 92M3 所出壶与牛村古城南 57H4M2 所出罐, 均于口沿下饰红色竖向波纹, 腹部亦有风格相近的彩绘, 两墓所出的舟形制和内壁所饰花纹也相近, 因此二墓年代应该相当。此两墓所出豆把均较矮, 加之下平望 92M3 还出有该地区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流行的空首布, 侯马下平望和牛村古城南墓地的发掘者认为这两个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应是合理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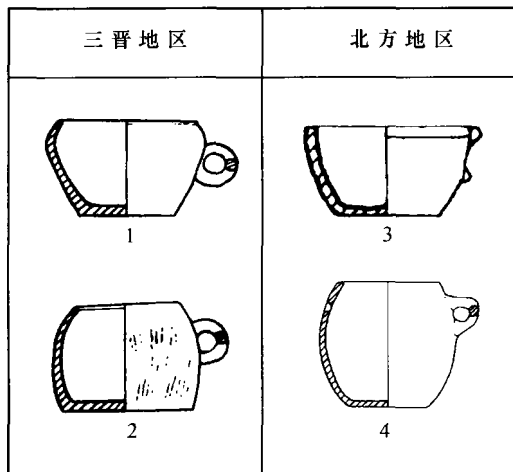
Bb 型 平底。牛村古城南 63H4M8:8, 其上部形态与前述 Ba 型无异, 只是平底无三足<sup>[57]</sup> (图八, 11)。与这种平底罐相同的铜双耳罐在太原金胜村 M251 也有发现, 金胜村 M251:557, 侈口, 束颈, 圆鼓肩, 小平底, 肩上双耳<sup>[58]</sup> (图八, 12)。

牛村古城南 63H4M8:8 之双耳罐与太原金胜村 M251 所出铜者相同, 年代亦应与之相近, 为战国早期。

## 6. 单耳杯

临县三交 M10 除了出土有上述双耳罐外, 还共出有 2 件单耳杯<sup>[59]</sup>, 临县三交 M10:7, 敛口, 下腹内收, 小平底 (图一〇, 1), 临县三交 M10:3, 敛口, 下腹直, 平底 (图一〇, 2)。

临县三交 M10 的年代如上述, 大体在战国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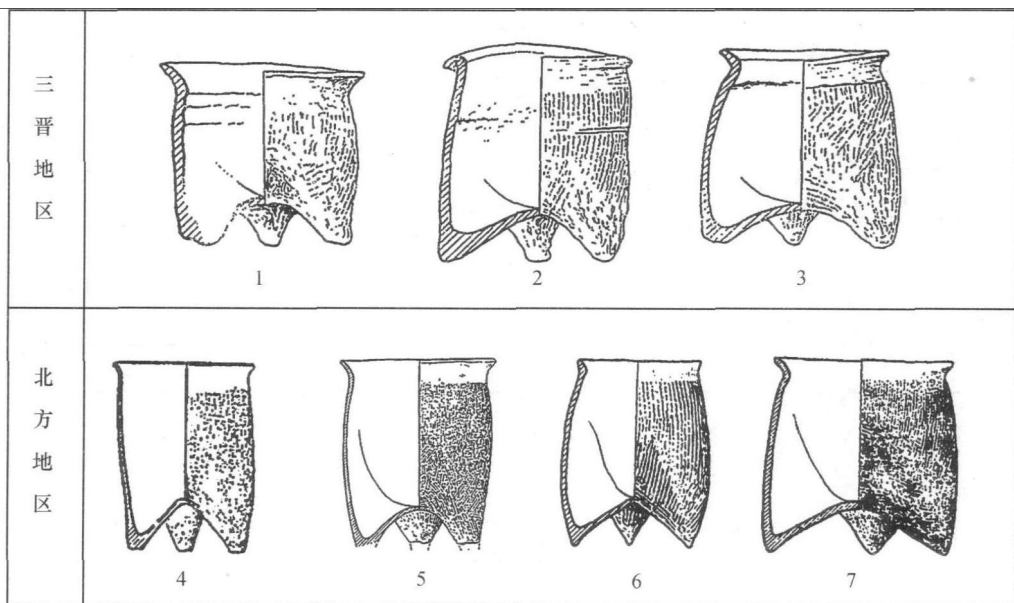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单耳杯

1. 临县三交 M10:7 2. 临县三交 M10:3 3. 中卫狼窝子坑 M4:5 4. 忻州窑子 M17:1

## 7. 鬲

在晋西南地区的侯马上马墓地随葬的大量陶器中，其主体部分是受到西周文化影响的陶鬲，数量多，延续时间长，是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晋文化的典型器物。还有一部分陶鬲，如上马墓地原报告中所划分的部分乙种鬲，如乙种未分型的第（2）组陶鬲（图一一，1、2），其突出特点是制作粗糙，长方体，直筒腹；乙种 Ba 型 I 式陶鬲（图一一，3），其特点是敛口，卷沿，斜直腹，三足外撇等，都表现出与周文化不同的特点<sup>[60]</sup>，可称之为非晋式陶鬲。由于出土有这种非晋式陶鬲的墓葬多缺少可以判断年代的其他器物，只能推测这些墓葬的年代大体与上马墓地年代相当，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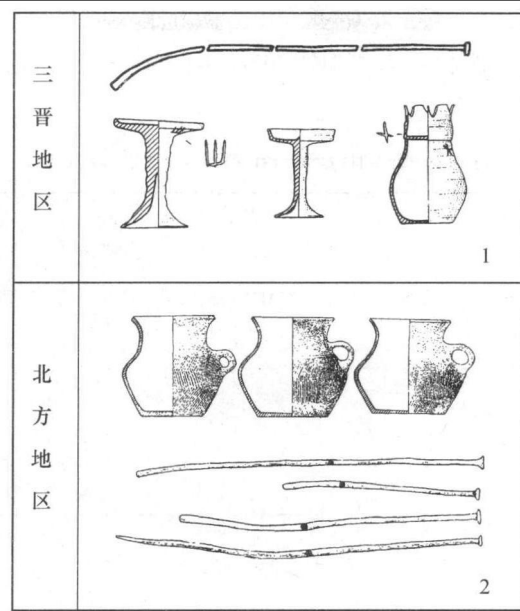
图一一 陶鬲

1. 侯马上马 M3177:1 2. 侯马上马 M6125:2 3. 侯马上马 M4010:1 4. 襄汾大柴 H3:9  
5. 太谷白燕 T127③D:1 6. 汾阳杏花村 M4:1 7. 灵石旌介 M2:4

## 8. 长丁字形骨器

山西怀仁县杨谷庄 M21 随葬有 1 件长 62 厘米的丁字形骨器<sup>[61]</sup>。此墓共出有仿铜陶礼器盖豆、壶，以及盘豆、盘、盒等（图一二，1）。由于原报告发表材料的局限，不能确知此墓所出全部器物的形制，原报告对该墓地年代的判断较为宽泛，属于战国时期，后有研究者提出该墓地出有仿铜礼器的 M9 的年代大体在战国中期早段<sup>[62]</sup>，可作为杨谷庄 M21 年代的参考。

三晋地区出土具有北方文化因素遗存的墓葬基本信息见表一。



图一二 长丁字形骨器

1. 怀仁杨谷庄 M21 2. 平鲁井坪“楼烦”墓

表一 三晋地区出土北方文化因素墓葬基本信息

墓葬	北方文化因素类别	性别	共出器物				时代	备注
			铜礼乐器	陶器	兵器/工具	车马器		
闻喜上郭村 76M1	A 型鍍	不清		有	有	有	春秋中期早段	
上马 M13	A 型鍍	不清	有	有	有	有	春秋中期晚段	
临猗程村 M0002	A 型鍍 2	男?	有		有	有	春秋晚期晚段	器物为征集, 原报告据其出兵器推测墓主为男性
侯马上马 M2008	A 型鍍 釜斧	男	有	有	有	有	春秋晚期早段	
临猗程村 M1072	A 型鍍	不清	有	有	有	有	春秋晚期晚段	
太原金胜村 M251	A 型鍍 铜双耳罐 釜内式戈	男?	有	有	有	有	战国早期	
沁水桃花沟	B 型鍍	不清	有					为征集
临猗程村 M0009	A 型带钩	不清		有			春秋中期晚段	
侯马上马 M2052	A 型带钩	不清					春秋中期晚段?	



续表

墓葬	北方文化因素类别	性别	共出器物				时代	备注
			铜礼乐器	陶器	兵器/工具	车马器		
侯马上马 M4039	B 型带钩	男					春秋晚期?	
临猗程村 M1084	C 型带钩	男		有			春秋晚期晚段	
侯马上马 M2216	C 型带钩	男					战国早期?	
侯马上马 M1223	C 型带钩	男					战国早期?	
洛阳王城广场 LM8	C 型带钩	不清	有			有	春秋晚期	被盗扰
米脂张坪 M2	带扣	不清		有	有		春秋中期早段	
长治分水岭 M269	釜斧	男	有		有	有	春秋晚期早段	据随葬器判断为男性
运城南相 M1	釜斧	男	有	有	有	有	春秋晚期早段	
汲县山彪镇 M1	釜斧	男?	有		有	有	战国早期	
临猗程村 M0007	Aa 型带双耳罐	不清		有			春秋中期	
侯马上马 M2028	Aa 型带双耳罐 A/B 型带钩	男		有			春秋晚期	所出带钩未见图像, 据所分式别应为本文所分 A 型或 B 型
侯马上马 M6364	Aa 型带单耳罐 C 型带钩	男					春秋晚期	所出带钩未见图像, 据所分式别应为本文所分 C 型
临猗程村 M1062	Aa 型带单耳罐	男	有	有	有	有	春秋晚期	
临县三交 M10	Ab 型带耳罐 单耳杯	男		有			春战之际到 战国早期	
清涧李家崖峰 M1	Ab 型带耳罐	不清		有			战国早期	
柳林杨家坪 M1	Ac 型带耳罐	男	有	有			战国早期	
侯马下平望 92M3	Ba 型带耳罐	不清		有			战国早期	
侯马牛村 古城南 57M2	Ba 型带耳罐			有			战国早期	
牛村古城南 63M8	Bb 型带耳罐			有			战国早期	
侯马上马 M1010	小鍪 A/B 型带钩		有	有	有	有	春秋中期晚段	所出带钩无图, 据所分式别应为本文之 A 或 B 型
怀仁杨谷庄 M21	长丁形骨器	女		有			战国中期?	原报告未报道各墓出土器物数量

## 二

上文所述东周时期三晋地区所见到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绝大多数都可以在中国北方地区找到其源头。

### 1. 铜（陶）鍪

三晋地区出现的 A 型鍪其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中国北方的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等地都有发现，其流行年代从西周晚期一直到战国前期，早期这种铜鍪大多为体型较大的实用器，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向中原化、小型化和明器化发展（参见图一，11~13）。B 型鍪则主要见于陕北和关中，以及冀北山地，年代为春秋后期到战国早期，未见小型化或明器化的 B 型鍪<sup>[63]</sup>（参见图一，14、15）。

在三晋地区还见到少量的陶鍪，如侯马上马 M1010 所出，不过在北方地区未见有陶鍪出现，侯马上马 M1010 所出小陶鍪应是三晋地区仿铜鍪明器化的产物。

### 2. 带钩

与三晋地区出现的 A 型带钩相同者见于北京延庆龙庆峡 M36<sup>[64]</sup>（参见图三，8）。该墓地位于军都山南麓<sup>[65]</sup>，属于典型的玉皇庙文化遗存。M36 所出的 I 式直刃匕首式短剑（M36:1）与军都山玉皇庙 M48:2 所出相同，玉皇庙 M48 位于墓地的北区，从地层上即属于该墓地的早期墓葬<sup>[66]</sup>。M36 随葬的马衔两端环近梯形，与该墓地 M2 所出相同，亦为玉皇庙墓地早期阶段马衔的特点<sup>[67]</sup>。M36 出土的其他器物，如双纽带钩，红陶夹砂陶罐，三鸟头带饰等，都是该墓地早期阶段流行的器物，据此龙庆峡 M36 的年代当在春秋中期晚段。

与三晋地区出现的 B 型带钩相同者在军都山玉皇庙、葫芦沟、宣化小白阳等玉皇庙文化遗存的墓地中都有发现，唯钩身上圆圈形凸起的数量不同，如葫芦沟 M6:4<sup>[68]</sup>（参见图三，9）。玉皇庙墓地共出有这种带钩 6 件，除了 1 件出于北区偏南的 M148 以外，其余 5 件均出于年代较晚的南区或西区<sup>[69]</sup>，因此玉皇庙墓地出土这种带钩的墓葬的年代大体应在春秋晚期。

与三晋地区所出 C 型带钩同样形制者在军都山玉皇庙、西梁堖、葫芦沟、滦平梨树沟门，以及平山县中山灵寿城等地都有发现，不过在这些地点发现的这种带钩除灵寿城所出以外，余者长宽比均较在三晋地区发现的同类带钩小。玉皇庙 M173:1，钩体最宽处即钩尾直径为 1.9 厘米，长 3.7 厘米，重 7.55 克，长宽比为 1.9（参见图三，11）；玉皇庙 M356:1，钩尾圆形有残，钩体最宽处即钩尾直径为 1.8 厘米，长 4 厘米，重 8 克，长宽比为 2.2。玉皇庙 M250:13 与上述两件相似，所不同的是其尾端的圆形钩体直径远大于纽，其上饰六圈呈同心圆的小圆圈纹，这件带钩长 4.5 厘米，长于 M356:1 和

M173:1, 但由于其尾端圆形钩体直径为 3 厘米, 长宽比仅为 1.5:1, 加之其重量为 24.8 克, 所以整体上给人以短粗厚重的感觉 (参见图三, 10)。玉皇庙 M250 位于北区北部, 因其共出有中原式青铜礼器, 朱凤瀚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认为其年代在春秋中期晚叶<sup>[70]</sup>, 不过其共出的铜鍍圈足似豆把, 在近底处向外成喇叭状, 着地处有一周凸棱, 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地区春秋晚期出现的盖豆的圈足形制影响, 因此 M250 的年代不应早于春秋晚期。M173 和 M356 均位于玉皇庙墓地的南区, 属于该墓地的较晚阶段, 年代应晚于 M250, 可能相当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河北平山灵寿城访驾村 M8102 出土的同形制带钩, 其钩尾圆面上外圈饰线条纹, 中心圆面饰虺纹, 长 4.8 厘米 (参见图三, 12), 宽度数据没有报导, 据线图比例推算为 1.9 厘米, 长宽比为 2.5:1。访驾村 M8102 共出有鬲形鼎、高柄盖豆、三足敦、提链壶、兽耳舟各 1 件, 同时还出有花格剑、援呈流线形的戈、车书和包金虎形牌饰, 原报告指出因该墓上部被灵寿城城垣所破坏, 因此其年代不晚于灵寿城修建的年代。据考灵寿城为中山桓公复国所建, 其始建年代大体在公元前 380 年<sup>[71]</sup>, 由此访驾村 M8102 的年代应在战国早期<sup>[72]</sup>。由此亦可看出在冀北山地和中山鲜虞地区出现的这种带钩, 其长宽比较大者年代相对较晚。

### 3. 带扣

与米脂张坪 M2 所出带扣形制上最为接近的当属在内蒙古岱海地区准格尔旗西麻青墓地发现者, 西麻青墓地所出带扣其尾端亦为梯形, 扣舌很大并明显高出环身, 只是在环面上有不甚明显的纹饰<sup>[73]</sup> (参见图五, 3)。西麻青墓地的随葬器物组合为鬲、盆、罐, 同时有双耳罐、单耳罐、铜盘丝耳环、带扣、料珠、骨簪等, 其年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种带扣春秋中期以后在西到宁夏北部的银南地区和固原地区, 向东北经包头地区一直向东到内蒙古岱海地区都有广泛的发现, 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地域性及其变迁》中曾对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sup>[74]</sup>, 张坪 M2 所出带扣尾部呈梯形, 扣舌较大并明显凸起于环身且延伸到环外, 扣舌与圆环相连等特点, 接近宫氏所分第一期中崞县窑子墓地的 M5:6 (参见图五, 4), 但仔细观察二者仍稍有不同, 而宫氏所分第二期以后的带扣尾部渐成小圆形, 扣舌也越来越小, 凸起渐低。因此张坪 M2 带扣所表现出的特点应该是比宫氏所分一期带扣更早的形式。崞县窑子墓地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 M5 属该墓地第一期墓葬, 在将第一期墓葬与毛庆沟墓地进行比较后提出其年代当与毛庆沟墓地一期墓葬相当, 毛庆沟一期墓葬的<sup>14</sup>C 数据为距今  $2690 \pm 125$  年, 其年代下限应在春秋晚期或稍早, 崞县窑子 M5 所属的第一期墓葬的年代也应与之相当<sup>[75]</sup>, 据此亦可表明上文所述张坪墓地的年代可以早到春秋中期也应是合理的推测。而在宁夏北部银南地区和固原地区出土的带扣, 扣舌小且仅微微凸起, 基本不超出扣环, 与宫氏所分之二期或三期的带扣相近, 有研究者根据其共出的中原式铜戈的比较, 认为这些遗存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之间<sup>[76]</sup>。

#### 4. 有銎兵器

与山彪镇 M1:110 相近的銎斧在宁夏北部中宁倪村 M1 和 M2 均有发现。M1:2 和 M2:1 形制接近,均扁圆銎,銎中部有穿以固定斧秘,刃呈长舌状,尾端为圆形<sup>[77]</sup>(参见图七,6、7)。原简报作者认为倪村 M1、M2 的年代为战国初期,后有学者将中宁倪村 M1、M2 划归甘宁地区东周时期青铜文化早期阶段,其年代下限为春秋晚期<sup>[78]</sup>。

在北方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与长治分水岭 M269、侯马上马 M2008 和运城南相 M1 所出的銎斧形制相同者,尤其是长治分水岭 M269 和侯马上马 M2008 所出銎斧在銎上端饰有中原风格的兽面纹,应该是三晋地区在接受了北方地区銎斧制作理念的基础上,加以自身文化传统的改造而形成的具有混合文化因素的器物。而在太原金胜村 M251 出土的銎内戈本是商周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广为流行的器物,在进入东周时期以后则基本不见。

#### 5. 带耳罐

在北方地区西到甘肃东部的甘谷毛家坪、内蒙古凉城地区的崞县窑子、忻州窑子和毛庆沟,东到冀北山地的张家口白庙等墓地,都发现有与在三晋地区出土的 Aa 型带耳罐相类的器物,如甘谷毛家坪 T1③:2<sup>[79]</sup>(参见图八,13)、忻州窑子 M21:1(参见图八,14)、忻州窑子 M11:2<sup>[80]</sup>(参见图八,15)、崞县窑子 M8:1<sup>[81]</sup>(参见图八,16)。甘谷毛家坪出有双耳罐的 B 组遗存主要见于该遗址的第③层,据原报告作者对于毛家坪遗址分期与年代的讨论,其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崞县窑子、忻州窑子、毛庆沟出土有双耳罐的墓葬的年代以及张家口白庙墓地出有带耳罐的墓葬的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大体都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sup>[82]</sup>。

与临县三交 M10:5 和陕西清涧李家崖峰 M1:15 相同的 Ab 型双耳罐见于内蒙古凉城地区,如崞县窑子 M7:3(参见图八,17),如上文所述,该墓地随葬有双耳罐的墓葬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sup>[83]</sup>。

与柳林杨家坪 M1:2 形制相同的 Ac 型双耳罐在北方地区较少见到,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赤峰地区发现有与之相近的器物。敖汉旗水泉墓地北区墓葬多出有一种夹砂褐陶的叠唇双耳罐,其形制与柳林杨家坪 M1:2 非常接近,只是前者为叠唇,或在口沿下有一周外加的泥条,素面(参见图八,18)。水泉墓地北区墓葬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战国之交或战国早期<sup>[84]</sup>。

与侯马下平望 92M3:5 和侯马牛村古城南 57H4M2:8 相同的 Ba 型三足双耳罐在河北平山县中山灵寿城有发现,如岗北村 M8011:24<sup>[85]</sup>(参见图八,19),中山国灵寿城发掘者认为此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早段,不过此墓所出的陶壶最大腹径在腹中部,鸟柱盆的鸟柱仅有鸟头和鸟尾稍高于盆口沿,而在三晋地区战国时期鸟柱盆的变化趋势是盆中之鸟柱越来越高出盆之口沿<sup>[86]</sup>,综上考虑岗北村 M8011 的年代当在战国早期为宜。

牛村古城南 63H4M8:8 所出的平底双耳罐以及与太原金胜村 M251 所出的铜双耳平底罐,在北方地区尚未见到相同者。不过在平鲁井坪“楼烦”墓中出土的单耳平底罐,似可作为讨论这种平底双耳罐来源的一个线索。平鲁井坪“楼烦”墓所出陶器仅有单耳平底罐,均为夹砂灰陶,敞口,束颈,腹上部鼓起形成肩部,肩上有单耳,平底,颈以下饰交错细绳纹,有烟炱<sup>[87]</sup>(图八,20)。这种单耳罐在陶质、纹饰以及功能上与三晋地区所出平底双耳罐均有相近之处,二者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系。

## 6. 单耳杯

单耳杯在西起宁夏银南地区,向东到内蒙古凉城地区都有发现,不过还没有发现与临县三交 M10 所出单耳杯形制完全相同者。其中与临县三交 M10:7 比较接近的是宁夏中卫狼窝子坑 M4:5,口微敛,下腹缓收,平底<sup>[88]</sup>(参见图一〇,3)。与临县三交 M10:3 比较接近的是凉城忻州窑子 M17:1,敛口,鼓腹,素面,下腹内收,小平底<sup>[89]</sup>(图一〇,4)。中卫狼窝子坑 M4 的年代原报告认为在春秋时期,有学者在对银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分期时曾指出该墓地除了 M1 外,其余墓葬的年代都比较早,为甘宁地区中期早段,年代在春战之际到战国早期<sup>[90]</sup>,忻州窑子 M17 的年代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

## 7. 陶鬲

与侯马上马墓地所出的乙种未分型的第(2)组陶鬲(参见图一一,1、2)相似的长方体直筒腹鬲,在丰镐地区西周时期遗存以及西周各封国遗存中很少见到,而在北方地区,自夏商以来则多见这种风格的陶鬲。可以在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遗址中找到相类者,如河北唐山古冶遗址<sup>[91]</sup>、山西太谷白燕遗址<sup>[92]</sup>、襄汾大柴遗址<sup>[93]</sup>等地均有这种长筒形腹的陶鬲发现,提供了自夏商以来一直到商周之际北方地区这种筒腹鬲存在发展的线索<sup>[94]</sup>(图一一,4、5)。

与上马墓地乙种 Ba 型 I 式陶鬲(参见图一一,3)相同的器物,在晋中地区商周时期的遗存中也有发现。已有学者指出这种陶鬲可以与晋中地区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的杏花村六期二段陶鬲、相当于殷墟早期的杏花村墓地 M4 所出陶鬲(参见图一一,6),以及灵石旌介共出有北方系青铜器的 M2 所出的陶鬲(参见图一一,7)连接起来,并提出可以作为寻找山西境内西周至春秋时期“狄”人遗存的线索<sup>[95]</sup>,很可能是这里土著文化因素的延续。

## 8. 长丁字形骨器

与杨谷庄 M21 所出长丁字形骨器相同的器物目前只见于山西平鲁井坪,在已发表的该基地的4座墓葬中,均随葬有长67~33厘米的丁字形骨器<sup>[96]</sup>(参见图一二,2),显然是该基地的典型器物。平鲁井坪墓地共出的陶器仅有单耳罐一种,也是该基地极具

特点的器物。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大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综上,在东周时期三晋地区出现的北方文化因素,以及与其相同的文化遗存,其年代与分布范围如表二。

表二 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相同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年代

		三晋地区		北方地区	
		地区	年代	地区	年代
鍬	A 型鍬	太原盆地 临汾盆地 运城盆地	春秋中期早段至 战国早期	陕北地区 关中地区 内蒙古中部 中山国地区	西周晚期到战国 早期
	B 型鍬	晋东南沁水 流域	春秋晚期早段	陕北地区 冀北山地 中山国地区	春秋中期晚段到 战国早期
带钩	A 型带钩	临汾盆地 运城盆地	春秋中期晚段	冀北山地	春秋中期晚段
	B 型带钩	临汾盆地	春秋晚期	冀北山地	春秋晚期
	C 型带钩	临汾盆地 运城盆地 洛阳地区	春秋战国之际到 战国早期	冀北山地	春秋晚期晚段
带扣		陕北西部 大同盆地	春秋中期早段	银南地区 固原地区 岱海地区	春秋早期到战国 时期
有釜兵器	釜斧	临汾盆地 运城盆地 安阳地区	春秋晚期早段到 战国早期	银南地区	战国早期
	釜内戈	太原盆地	战国早期	北方地区	商周时期
带耳罐	Aa 型带耳罐	临汾盆地 运城盆地	春秋晚期	陇东地区 岱海地区 冀北山地	春秋晚期到战国 时期
	Ab 型带耳罐	南流黄河 两岸	战国早期	岱海地区	春秋晚期到战国 早期
	Ac 型带耳罐	南流黄河 东岸	战国早期	赤峰地区	春秋战国之际到 战国早期
	Ba 型带耳罐	临汾盆地	战国早期	中山国地区	战国早期
	Bb 型带耳罐	太原盆地(铜) 临汾盆地	战国早期	?	

续表

	三晋地区		北方地区	
	地区	年代	地区	年代
单耳杯	南流黄河东岸	战国早期	银南地区 凉城地区	春秋晚期到战国 早期
鬲	临汾盆地 运城盆地	西周晚期到春秋 晚期	河北东部 晋中地区	商周时期
长丁字形骨器	大同盆地	战国中期早段	吕梁山北麓	春秋晚期到战国 早期

通过表二的归纳,可以清楚地看出三晋地区出现的北方文化因素有着不同的来源。

第一种包括 A 型甗、B 型甗、Aa 型带耳罐,是在中国北方地区相当广泛的范围内都存在的遗存,从春秋中期早段一直到战国早期都有出现。这些文化因素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广泛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明这些文化因素所具有的广泛的流动性,同时也说明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大范围的文化趋同。这些文化因素主要发现于三晋地区的晋西南、晋东南和晋中地区,年代都在三家分晋之前,而这些文化因素出现在三晋地区,所表现的应是至晚在春秋中期开始,一直到战国早期三家分晋之前的晋文化与中国北方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交往与互动。其中三晋地区所出现的 A 型甗,表现出明器化和礼器化的趋势,已与北方地区铜甗主要作为炊器的功能不同,是北方文化因素被中原化的结果。

第二种包括带扣、釜斧、Ab 型带耳罐和单耳杯,主要是来自中国北方地区西部的宁夏北部银南地区以及中部的内蒙古岱海地区,年代亦从春秋中期早段一直到战国早期。近有学者将这些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称之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二种文化遗存,认为其大多数应属于文献记载中的“胡”<sup>[97]</sup>。在三晋地区这些文化因素主要见于南流黄河两岸、雁北、晋西南和安阳地区,其中南流黄河两岸和雁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都非常靠近内蒙古岱海地区,均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缘,其年代也大都晚于北方地区的同类遗存。在这里发现的北方文化因素中既有服饰用器,也有日用陶器,还有兵器,前两项或许与北方文化人群的流入或两方人群的直接交往有关,而兵器主要是釜斧,已饰以中原礼器的纹饰,则很难看成是战争的战利品,亦应是北方文化被中原化的结果。

第三种包括 Ac 型带耳罐,年代在战国早期,目前只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见到与此相近者,后者的发掘者认为这种带耳罐是凌河文化的叠唇罐和长城地带中部地区流行的带耳陶器结合的产物<sup>[98]</sup>。由于 Ac 型带耳罐仅见于南流黄河东岸吕梁山西麓,与目前发现同类器物的内蒙古赤峰地区相隔较远,年代稍晚,在二者的中间地带也缺乏相关资料,暂时尚不能说明二者之间产生这种关联的原因。

第四种包括各种带钩和 Ba 型带耳罐,主要见于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和冀西南的中山故地,年代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春秋中期以后冀北山地主要分布着玉皇庙文

化,有学者指出其应属于由狄人建立并在战国早期被赵襄子所破的“代”<sup>[99]</sup>,而在保定南部到石家庄地区分布的中山遗存已因在这里发现的中山王墓以及中山都城“灵寿城”而得到证实<sup>[100]</sup>。由中山王墓的发现引发了学界对于中山国历史的关注,认为中山国是东周时期由狄人建立的小国基本已成为学界的共识<sup>[101]</sup>,更有学者指出中山国是由被赵所灭的狄人中最主要的一支南迁而建立<sup>[102]</sup>,因此冀北山地的玉皇庙文化与冀西南的中山遗存均可视为东周时期的狄人文化遗存。在三晋地区这种文化因素主要见于晋西南和洛阳地区,最多见的是服饰用具带钩,也是该地区最早出现的带钩<sup>[103]</sup>,带钩的出现意味着系带方式的改变,这应该是在不同的人群间存在着最为普遍亦最为直接交往的基础上而产生的结果。

第五种主要是分布在临汾盆地的各种非晋式陶鬲,在侯马上马墓地有较为集中的发现,年代从西周晚期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之际<sup>[104]</sup>。这些陶鬲由于其明显不同于三晋文化陶鬲的特点而被认为是非晋文化因素,如上文所述,已有学者在将其与本地商周以来的土著文化遗存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这种陶鬲是在山西境内寻找西周至春秋时期狄人遗存的线索<sup>[105]</sup>。若这种文化因素确实来自于商周以来即存在于此地的土著文化,那么可以推测在三晋地区范围内实际上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东周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融合。

第六种主要是分布在山西北部大同盆地的丁字形骨器,年代大体在战国中期早段。此时这一地区已属赵。这种丁字形骨器目前最集中的出土地点在吕梁山北麓的平鲁井坪墓地,原报告认为埋入该墓地的人群应为文献记载中东周时期活动在晋北的“楼烦”,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sup>[106]</sup>。二者分布地域均为雁北地区的大同盆地,从年代上的早晚可以看出,三晋文化中出现的长丁字形骨器很可能是被称为“楼烦”的人群在赵并此地后的遗留。

而在太原盆地出现的铜双耳罐以及与之形制相同的见于临汾盆地的陶 Bb 型带耳罐,由其双耳判断应源自北方地区带耳器物的风格,但目前因材料所限,尚不能确知其来源。

### 三

观察各出土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墓葬(参见表一)可以看出,出土有铜鍪、小陶鍪和釜斧的墓葬中,除了出有 A 型鍪的闻喜上郭村 76M1 未见青铜礼器,出有 B 型鍪的沁水桃花沟因非正式发掘而不能确知其随葬器物组合原貌外,其余均为随葬有成组青铜礼器的墓葬,其中还包括了汲县山彪镇 M1、太原金胜村 M251 这种被认为是战国早期诸侯国重卿的大型墓葬。闻喜上郭村 76M1 所出铜鍪,通高为 29.2 厘米,是为实用器,沁水桃花沟所出通高为 24.8 厘米,且通体有烟炱,亦为实用器。在那些随葬有成组青铜礼器的墓葬中出土的铜鍪,通高均在 7 厘米以下,显然已经明器化。A 型鍪在中国北方



地区出现的时间可以早到西周晚期,早期这种铜鍪大多为体型较大的实用器,主要流行在陕北、关中西部、内蒙古中部以及冀北山地,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向中原化、小型化和明器化发展。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B型鍪,器高均在20~30厘米,且均为实用器<sup>[107]</sup>。闻喜上郭村76M1虽未见随葬青铜礼器,但也随葬有铜戈、铜镞、马衔、骨镞等器物,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武士,加之其所出的铜鍪为实用器,与其他在有青铜礼器随葬的墓葬中所出铜鍪均为小型化的明器不同,这些现象似乎表明,闻喜上郭村76M1出现的铜鍪很可能是墓主人参与了与上述地区的某种军事行动从而直接获得了这件器物并将其放入墓中,应该是一种偶发的个人行为。沁水桃花沟所见B型鍪亦保留了其原为实用器的功能,其出现的原因当与闻喜上郭村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随葬有A型鍪或小陶鍪的墓葬,所有铜鍪均已小型化和明器化,笔者在《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一文中已指出,这些明器化的铜鍪“除了还保留着作为北方文化铜鍪的器形以外,在纹饰、细部风格和用途上,都表现出高度的中原化,因此很难认为这些铜鍪是由北方文化生产后传入,将其视为中原列国文化或秦文化对北方文化铜鍪进行改造后的产品,应该是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这些墓葬的年代都在三家分晋之前,因此可以更确切地说,在晋文化地区当时是将这种明器化的铜鍪作为青铜礼器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有随葬有青铜礼器的高等级贵族才将其作为随葬品放入墓中,这或许表现出晋文化社会中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对这种来自于北方地区的器物重视,同时也说明在晋文化统治集团的心目中,与这些铜鍪所来自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关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偶发行为,而是一种集团的共识。

釜的情况与A型鍪相类,目前发现随葬有釜的墓葬均为青铜礼器墓,年代亦均在三家分晋之前。其中长治分水岭M269和侯马上马M2008出土的釜除了以釜纳柄的装柄方式还保留着北方地区有釜兵器的特点以外,其上装饰着中原风格的兽面纹,具有明显的中原化以及礼仪化色彩。由于釜在中国北方地区主要见于西部地区,因此这些现象说明晋文化地区在与北方地区的西部以军事行为为主要媒介的交往中,在社会上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兵器中原化后作为表示自己身份的象征,以显示对与这些地区关系的重视。而在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的釜内戈在北方地区进入东周时期以后已经基本不见,很可能是墓主人将其家族的传世品葬入墓中,似乎也表现了其与北方地区所具有的更为久远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珍视。

与铜鍪、釜情况不同的是,三晋地区出土有北方地区风格的带钩、带扣、长丁字形骨器,以及各种陶器的墓葬,绝大多数均为仅出陶器,甚至不见陶器的墓葬,只有个别墓葬为随葬有1件铜鼎的一鼎墓。可以鉴定墓主人性别的墓葬中,除了出长丁字形骨器的怀仁杨谷庄M21为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年代除了怀仁杨谷庄M21可以到战国中期外,其余各墓均在三家分晋以前。各种形制的带钩主要来自冀北山地的“狄人”文化遗存,而各种陶器的来源则较为复杂,或来自于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或来自于北方地区的西部、北部,以及冀北山地,甚至来源于本土的土著文化。从这些现象可以得

知,在三晋地区使用带钩、带扣、陶器等这些带有北方文化因素器物的人群主要为处于社会较低阶层者,由他们大多为男性可知这些墓葬的墓主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不是由于联姻而进入三晋地区,因此这些器物的出现很可能是与北方地区人群的流入或本地土著人群的延续有关。不过发现出土有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墓葬数量与同时期三晋地区墓葬的数量相比比例很小,目前尚不能确知是由于这种人群的流动本身即是偶然现象从而导致数量较少,还是进入到三晋地区的北方文化的人群已经接受了三晋地区的文化而不再使用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通过表二可以知道,三晋地区出现北方文化因素最为集中的地区是位于晋西南汾河流域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前者主要集中在侯马地区,后者主要见运城盆地北缘的临猗地区,在这些地点都发现了上文所划分的第一、二、四、五种北方文化因素,既有在中国北方地区文化中广泛见到者,又有分别见于“狄人”和“胡”人者,也有来自本土的土著文化因素;其中既有已经礼器化的铜甗和礼仪化的盃斧,也有普通服饰用的带钩和日用陶器;出现北方文化因素的墓葬包括了较高规格的大、中型铜礼器墓,也有仅出有陶器、甚至连陶器都没有仅有少量几件随葬品的小型墓葬。侯马地区为春秋中期晚段(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至战国早中期之际(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晋国都城新田所在,而运城盆地的临猗地区,据考亦为晋之重卿范氏之邑<sup>[108]</sup>,在这里发现的出现北方文化因素墓葬的年代基本与晋都新田的时间相当,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出现了多样化的北方文化因素应与这里是都城或晋之重卿所在地区有关。这些现象说明当时如都城、重卿之邑这样的高等级居址在文化上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文化间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交流都具有相当的活跃性。

发现第三种遗存的地点仅在南流黄河东岸的柳林地区,这里位于吕梁山西麓,流入南流黄河的几条支流发源于这里,其东与三晋地区的中心地区汾河流域则相隔有吕梁山,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柳林杨家坪 M1 中出现的北方文化因素是作为日用陶器的 Ac 型带耳陶罐,并共出不成组的青铜礼器(鼎 1、铜盖豆 2)以及一套仿铜陶礼器(陶鼎 1、陶豆 2、陶壶 2),时间为战国早期,应在三家分晋之前。柳林杨家坪墓地共发现 13 座战国时期墓葬,均随葬有数量不等的仿铜陶礼器,除 M1 和 M28 为头向西以外,其余 11 座墓葬均为稍偏东的北向,另外从简报发表的 M1 和 M18 两座墓葬的平面图看, M1 随葬器物中双耳陶罐与铜鼎、铜盖豆和陶壶置于墓主人头端棺椁间的西南外,另有一铜盖豆与陶鼎、陶豆、陶壶各 1 件置于墓主人足端棺椁间的东部,而 M18 为北向,所有的随葬器物(陶鼎 2、盖豆 2、壶 2、盘 1、匜 1、舟 1)均置于墓主人右侧的棺椁间西部<sup>[109]</sup>。由于不知道其他的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放置情况,加之 M18 墓主人为女性,所以不清楚这两种不同的随葬器物摆放方式是出于性别差异,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无论如何, M1 共出青铜礼器而同墓地的其他墓葬不见随葬青铜礼器,表明该墓的墓主人应具有可以使用青铜礼器的权力,而北方文化因素的双耳罐与部分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放在一起,似乎说明墓主人对这件双耳罐的重视,很可能这件双耳罐对于墓主人来说具有特

殊的意义。由于材料的局限,目前还只能推测很也许是墓主人与这种双耳罐所代表的文化间有着某种关系,同时亦反映出晋文化在这一地区与北方文化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第六种遗存,即长丁字形骨器,仅在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有发现,其出自三晋文化小型墓葬,年代已到战国中期。由于这种丁字形骨器仅在吕梁山北麓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所谓“楼烦”墓中有发现,而前者分布地域亦为雁北地区的大同盆地,从年代上的早晚可以看出,三晋文化中出现的长丁字形骨器很可能是被称为“楼烦”的人群在赵并此地后的遗留。这种现象表明,战国中期由于赵国的北扩,在其所到之处原本属于北方地区古代文化的人群已经融入赵文化之中。

## 四

本文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东周时期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间的文化互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处于三晋文化社会中较高阶层的人群在接受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同时,摈弃了其原本作为炊器和实战兵器的功能和意义,而是将其纳入到自己原本已有的礼制系统,如铜鍪的明器化和礼器化,釜斧的礼仪化等,这样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上的互动很可能表明三晋文化中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着对与北方文化间关系的重视。而处于三晋文化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群在接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同时,是延续了其实用的功能,如带钩、日用陶器等,尤其是带钩给三晋地区腰带的系带方式带来了改变,使得带钩开始在中原地区甚至更为广泛的地域流行开来,这样一种低层次的文化上的互动表现出三晋文化中处于较低阶层的人群更看重的是北方文化中的实用价值可以带给自己某些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

第二,东周时期三晋地区较多出现北方文化因素的地点集中在当时的晋都和重卿之邑,表明在东周时期的三晋地区,居址级别与其文化上的开放程度呈正比,这种文化上的互动也就带有更多的集体意识。而在其他地区零星出现的北方文化因素,则很可能与个别的人群流动有关,带有更多的个体行为色彩。

第三,在三晋地区出现北方文化因素的时间绝大多数都在三家分晋之前,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目前还只在处于三晋地区北部的赵文化中见到与北方文化有关的遗存。这种现象表明作为三家分晋以前的晋文化与北方文化间的关系要较后来的韩文化、赵文化、魏文化更为密切。而在韩、赵、魏这三个诸侯国文化中,又以赵国表现出与北方文化间有着更多的关系。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周时期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2008JJD780113)的中期成果,该成果还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 注 释

- [ 1 ] 张辛. 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iii.
- [ 2 ] 苏秉琦.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J]. 文物, 1981 (5): 10-17.
- [ 3 ] 滕铭予. 秦文化: 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34-54.
- [ 4 ] 林沅.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沅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9-76;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 5 ] 郭物. 青铜鍪在欧亚大陆的初传 [A]. 欧亚学刊 (第一辑)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122-150.
- [ 6 ] 滕铭予. 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4-54.
- [ 7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976 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 [A]. 三晋考古 (第一辑)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123-138.
- [ 8 ]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 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 [J]. 考古, 1963 (5): 229-245.
- [ 9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70.
- [ 10 ] 赵慧民, 李百勤, 李春喜. 山西临猗县程村两座东周墓 [J]. 考古, 1991 (11): 987-994.
- [ 1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101.
- [ 12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晋国赵卿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30.
- [ 13 ] 李继红. 沁水县出土的春秋战国铜器 [A].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三) [C].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294.
- [ 14 ] 滕铭予. 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4-54.
- [ 15 ] 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618 中关于侯马上马 M13 的论述.
- [ 16 ] 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618-1619 表中所记, 下文中所提到的此书对于各墓葬年代的判断, 若无专门讨论, 则均来自于所列各时期墓葬登记表, 本文将不再加注.
- [ 17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328.
- [ 18 ] 认为公元前 470 ~ 450 年为春秋晚期缘于公元前 403 年三家分晋始为战国之始的认识, 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244-246.
- [ 19 ] 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906 关于此墓年代的讨论.

-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74.
- [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43.
- [22] 如在长治分水岭属于战国早期的 M14 随葬了 3 件铜人饰, 均腰系带但未见使用带钩, M126 出土了一件铜牺盘, 牺兽上有立人, 腰系带但未见使用带钩. 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博物馆, 长治市博物馆.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128.
-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93.
-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93.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128.
- [2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93.
- [29] 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 [3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423.
- [31] 林沄.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A]. 林沄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68-386;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另在军都山玉皇庙墓地也出土了两件带扣, 亦有学者将其视为冀北山地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通过上文对带钩的讨论, 可知在这一地区系带是以具有特色的带钩为主, 在这里发现的带扣应是玉皇庙文化的人群与其西边使用带扣的人群有所交流的体现.
- [3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实习组, 陕西省考古所商周研究室. 陕西米脂张坪墓地试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89 (1): 14-20.
- [33] 杨建华. 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 [J]. 考古学报, 2009 (2): 155-184.
- [34]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沄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9-76.
- [3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75.
- [36] 山西运城行署文化局, 运城地区博物馆. 山西闻喜邱家庄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83 (1): 5-11.
- [37] 高峰, 张海啸, 安孝文. 怀仁县杨谷庄战国墓清理简报 [A].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三) [C].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65-71.
- [38] 林沄.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A]. 林沄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262-288.
- [39] 朱永刚. 中国北方的管鬲斧 [J]. 中原文物, 2003 (2): 30-50.
- [40] 林沄.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A]. 林沄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262-288.
- [41] 郭宝钧. 山彪镇与琉璃阁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29.
- [4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博物馆, 长治市博物馆.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342-343.
- [4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75.

- [44] 王志敏, 高胜才. 运城南相春秋墓清理简报 [J]. 文物世界, 1990 (1): 39-44.
- [4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晋国赵卿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93-94.
- [46] 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892 和 1906 中有关山彪镇 M1 和金胜村 M251 年代的论述.
- [4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37.
- [4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北考古工作队. 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秦墓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87 (3): 1-17.
-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137.
- [5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37.
-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137.
- [5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吕梁地区文物管理处. 临县三交战国墓发掘简报 [A]. 三晋考古 (第一辑)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304-312.
- [5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北考古工作队. 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秦墓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1987 (3): 1-17.
- [54] 吕梁地区文物事业局, 柳林县文物管理所. 1997 柳林县杨家坪战国墓葬清理简报 [A].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三) [C].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42-50.
- [5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侯马下平望墓地发掘报告 [A]. 三晋考古 (第一辑)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207.
- [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侯马牛村古城南墓葬发掘报告 [A]. 晋都新田 (下编)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94-248.
- [5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侯马牛村古城南墓葬发掘报告 [A]. 晋都新田 (下编)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94-248.
- [5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晋国赵卿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30.
- [5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吕梁地区文物管理处. 临县三交战国墓发掘简报 [A]. 三晋考古 (第一辑)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304-312.
- [6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123-134.
- [61] 高峰, 张海啸, 安孝文. 怀仁县杨谷庄战国墓清理简报 [A].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三) [C].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65-71.
- [62] 黄朝伟. 战国时期赵国墓葬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63] 关于 A 型和 B 型铜鍪流行的范围与年代请参见滕铭予. 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4-54.
- [6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龙庆峡别墅工程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 [A]. 北京市文物与考古 (第四辑) [C]. 1994: 32-45.
- [65] 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龙庆峡别墅工程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 [A]. 北京市文物与考古 (第四辑) [C]. 1994: 32 对于该地点的说明.

- [66] 玉皇庙墓地地层的早晚关系请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2.
- [67] 关于玉皇庙墓地 M2 的年代, 请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118-2136.
- [68] 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堽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300.
- [69] 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军都山墓地——玉皇庙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223-1224.
- [70] 参见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 (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122.
- [7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5.
- [7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290.
- [73] 曹建恩. 内蒙古中南部商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6 (2): 16-26.
- [74] 宫本一夫.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地域性变迁 [A]. 岱海考古 (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454-481.
- [7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凉城崞县窑子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9 (1): 57-81.
- [76]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77]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 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 [J]. 考古, 1987 (9): 773-777.
- [78]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41.
- [79]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北京大学考古系. 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1987 (3): 359-396.
- [8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 [J]. 考古, 2009 (3): 28-48.
- [8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凉城崞县窑子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9 (1): 57-81.
- [82] 关于崞县窑子、毛庆沟出土有双耳罐的墓葬的年代以及张家口白庙墓地年代的讨论, 请见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第二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8-95. 忻州窑子的年代请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 [J]. 考古, 2009 (3): 28-48.
- [8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凉城崞县窑子墓地 [J]. 考古学报, 1989 (1): 57-81;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第二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8-95.
- [84] 郭志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 [A].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97-309.
- [8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317.
- [86] 黄朝伟. 战国时期赵国墓葬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87] 支配勇, 高平如. 鲁鲁井坪楼烦墓 [J]. 文物季刊, 1992 (1): 20-23.
- [88] 周兴华. 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 [J]. 考古, 1989 (11): 971-980.

- [8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 [J]. 考古, 2009 (3): 28-48.
- [90]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第二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40.
- [91] 文启明. 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 [J]. 考古与文物, 1984 (6): 1-11.
- [92] 晋中考古队. 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9 (3): 1-21.
- [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7 (7): 586-596.
- [9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八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284-299.
- [95]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沄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9-76.
- [96] 支配勇, 高平如. 平鲁井坪楼烦墓 [J]. 文物季刊, 1992 (1): 20-23.
- [97] 杨建华. 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 [J]. 考古学报, 2009 (2): 155-184.
- [98] 郭志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 [A].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97-309.
- [99] 林沄.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 [A]. 林沄学术文集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68-386; 杨建华. 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 [J]. 考古学报, 2009 (2): 155-184.
- [10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晋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101] 比较集中的对于中山国历史的考证见 (清) 王先谦撰, 吕苏生补释.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另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晋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中也有关于中山国历史的概述.
- [102]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沄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9-76.
- [103] 曾有学者提出, 中原地区最早的带钩出于洛阳中州路 M2205, 年代为春秋中期, 见王仁湘. 带钩概论 [J]. 考古学报, 1985 (3): 267-312. M2205 共随葬有鬲 1 件, 甗 2 件, 带钩 1 件, 水晶珠 2 件, 除了甗和水晶珠发表有线图外, 鬲与带钩均未有发表的图像资料, 因此判断此墓的年代依据稍显不足.
- [104]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 (第三章)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年) 中的部分乙种陶鬲, 以及第八章第二节中关于文化结构的讨论.
- [105]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A]. 林沄学术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9-76.
- [106] 支配勇, 高平如. 平鲁井坪楼烦墓 [J]. 文物季刊, 1992 (1): 20-23.
- [107] 滕铭予. 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鍪的再探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 1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4-54.
-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化局, 临猗县博物馆编著. 临猗程村墓地 (第四章)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 [109] 吕梁地区文物事业局, 柳林县文物管理所. 1997 柳林县杨家坪战国墓葬清理简报 [A].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三) [C].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42-50.

## **The Northern Culture Factors in Sanjin Area of Eastern Zhou**

TENG Ming-yu WANG Chun-bi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northern culture factors in Sanjin area of the Eastern Zhou,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different for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anjin area and the northern area. When the high-ranking people in Sanjin accept the northern culture elements, they also took the northern culture elements into their own courtesy system, so they show more their respect to the northern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low-ranking people in Sanjin area accept the northern culture elements, they accept their useful function, so it seemed that they thought a lot of the changing by the northern culture. The northern culture elements in Sanjin appeared mostly in the capital of Jin and important cities with many high-ranking people. The inhabitation sites scale were in proportion to the open cult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brought more and mor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But the northern culture elements occurred in other areas, maybe because of the migrant, so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isolated phenomena.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Jin culture and the northern culture before the Jin' abrupton was closer than the relation among the Han culture, the Zhao culture and the Wei culture. Among the Han, Zhao, Wei, the Zhao had a closer ties with the northern people.